

书评 2

林月惠 《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金起賢

—

宋接到林月惠(下文略称为“作者”)的力作《异曲同调》后，我(下文略称为“评者”)非常高兴。尤其是台湾学者能够写出这种主题的著作而感到欣慰。阅读的时候也很惊讶，因为作者的准备非常彻底，估计本着作将对学术界作出很大的贡献。大多数国外研究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对韩国的研究成果不是很了解，在这一点上作者跟其他的研究者有明显的不同。他对韩国国内资料的收集和引用以及对韩国学者观点的理解，都令评者感到由衷的钦佩。

这是一部深入研究朝鲜时代(1392—1910)性理学的著作。除了以议论形式出现的附录〈郑霞谷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理解〉之外，这本书由〈导论〉和 7 篇文章组成。第一章的主题是‘李退溪对四端七情的诠释’，第二章的主题则是李退溪对‘格物、物格’的解释。第叁章的主题是‘罗整菴与李退溪的理气

论’。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对‘人心道心说’的论述，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是罗整菴的‘人心道心说’以及朝鲜时代性理学者对此的回顾与批判。第六章是李退溪的‘人心道心说’，第七章是李栗谷对‘人心道心说’的论述。一直到第七章共 330 页，是一本相当厚的书。

二

评者认为所谓的哲学研究应如下：“学术思想的发展，本就是异同分合和引申发挥的过程。学者的工作，在于辨析其异同之关节，探究其分合之源委，理清其问题之意义，以确定其义理纲维，分判其义理系统(...)并就其具有永恒价值与时代意义之部分，阐发而光大之”（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文津出版社，1991 年，158 页）。但对朝鲜性理学的研究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乍一看，许多朝鲜时代儒家学的研究似乎都是朱子学或程朱理学的重新演绎。并且也有很多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过去有些人认为“代表朝鲜性理学的李退溪和李栗谷的儒学思想是朱子学的亚流”，或者认为“朝鲜时代性理学是朱子学的翻版”等。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以分两种情况：要么学问浅薄要么意图不纯。后者包括殖民时期（1910—1945）的日本官学者，其代表人物是高桥亨。

依评者看，高桥亨并不是学问浅薄之人。他在大学学到了欧洲近代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仅如此，他还精通韩国语，因此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的知识分子。即使他离开韩国数十年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的学者在探讨朝鲜儒学时仍然摆脱不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朝鲜朝的性理学自朱子学以来没有任何的进步，就是在强调‘朝鲜性理学是朱子学的重新演绎’这个观点。还为了论证朝鲜的儒学者所谓的党派之争，他把朝鲜性理学分为‘主理派’和‘主气派’，力说他们之间的对立。

作为研究韩国传统思想的日本官学者，高桥亨不需要研究殖民地朝鲜儒学的独自性或者独创性，即便是提出这种观点，也基于自身利益也不会去承认。总

而言之，他的观点就是：朝鲜民族有能力但不会团结，又善于党派之争，所以在哲学方面也只能起鸚鵡般的作用。因此，朝鲜民族只能在日本的统制下才能发挥自身的能力。他的这种观点只会导致扭曲的朝鲜性理学思想。

因为受他影响有不少韩国知识分子认为，朝鲜性理学是中国朱子学的复制或翻版。甚至有些研究中韩儒学的韩国学者也这样认为。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对朝鲜时代的性理学家李退溪和李栗谷并没有深入了解。其中大部分都是根据个人喜好，要么推崇以‘实学’堪称的茶山丁若镛的儒家思想，要么排斥韩国的传统思想以便推崇西方思想。

对于四端和七情，朱熹曾做过“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的论述。（《朱子语类》卷 53，第 83 条）李退溪与奇高峰论辩时曾提到过此句（《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但不论是李退溪还是奇高峰，之后的性理学者都无视朱熹的这段论述，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性理学思维和理论进行摸索与研究。‘人心道心说’也属于这种情况。从表面来看，似乎是程朱理学的同语反复，实际上却包括义理思想的脉络和哲学的苦恼。研究者们是应该去把握和显现这些内涵。

就日本学者对朝鲜性理学研究而言，到了 20 世纪后期（1970 年代以后），原本盛行于日本殖民时代，以高桥亨为代表的“翻版”理论逐渐转变为与其相对立的观点。1985 年发表《李退溪》一书的友枝龙太郎也对李退溪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李退溪的思想之精湛，可以堪称为韩国哲学思想的卓越的特质”。同年，出版《李退溪と敬の哲学》的高桥进也做了“虽然新儒学历来被人们看成是由朱子集其大成的，但是 … 我就宁愿将确立主敬哲学的李退溪看成装新儒学作为要有个性的实践哲学再集大成的思想家”（高桥进，王根生 等译，《李退溪和主敬哲学》，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203 页）的评价。从此以后，日本少壮派学者对朝鲜性理学的研究，表现为更加积极和精湛。

这本书是作为国外学者的林月惠对朝鲜性理学的研究，因此这本书的关键在于作者如何去研究从表面上似乎与朱子学没什么差异的朝鲜性理学，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三

以评者的角度来看，作者对朝鲜性理学学界作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将朝鲜性理学的完成过程与明代的理学开展相结合，研究其相关关系。这个论题就是从北宋的周濂溪开始的理学到朱熹以后在中国和韩国所得到的发展，这个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极深极广的学术能力。第二，作者从自己的视觉探讨朝鲜性理学的核心问题，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人心道心說’，就区别于其他的研究成果。

杜维明在 1982 年的李退溪研究论文中，评价退溪的哲学是“对朱熹思想的具有独创性的解释(creative interpretation)”，还认为“到了陳獻章(1428—1500)时代，中国的性理学开始脱去朱熹固有思路的影响。王阳明(1472—1529)针对朱熹二元論的攻略，为宋明思想带来新的倾向。王阳明对性理学再照明的成功，也许就是中国没有出现退溪现象的主要原因”(36 页)。成中英在 1986 年的论文中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孟子学注重理朱子学注重气，而朝鲜时代的李退溪则摸索出将二者相提并论的新的体系”。按照成中英的观点，李退溪虽是忠实的朱子学者，但作为核心理论的“理”，却更加接近孟子(Chung-ying Che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oegye's Four-Seven Theory in Light of Mencius and Chu Hsi”，《退溪学报》52 輯)。这种观点以孟子的心性論虽被阳明学所繼承，但朱子学与孟子学还有一定距离的理论作为前提。

韩国学界仅限于所谓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朝鲜时代的儒学对性理学一边倒’，‘朝鲜时代研究阳明学的人受到压迫’等等。然而从宏观来看，朝鲜儒学界或许不需要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明代的理学者是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对朱子学的不满，而朝鲜朝理学界也许不需要阳明学或阳明学式的理论。换句话说对朝鲜朝理学家，阳明学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他们认为朝鲜性理学已经包

括那些使明代理学家们不滿的因素。

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针对 16 世纪罗整菴和王阳明时代的朝鲜性理学界她如此说到：

“此一时期的朝鲜学界，並非只停留在對宋代程朱性理学的片面理解而已，而是百家爭鳴的不斷攻錯，辨析入微，论爭紛起，其觸媒就在於罗整菴思想、阳明思想的激盪，引發朝鮮性理學者的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由此顯示他門對朱子学詮釋的深度及多樣化” (17-18 页)。

但是下面的敘述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期待：“在中国的宋明理学發展中，朱子之後，王阳明挑戰朱子綿密的思想體系，衝破藩籬，脫離朱子学的思考格局，才真正確立‘心即理’的義理型態。然而，朝鮮性理學卻在朱子学的脈絡中深究，幾經轉折，歷時數百年，才趣向‘心即理’，以此作為聖學宗旨。這樣的取徑，脫胎於朱子学，始於李滉理氣互發說，沿著‘主理’的傾向，終於在朝鮮末期的‘心即理’說中，看到朱子学的另一種歸趣” (42-43 页)。朝鮮后期一些性理學者們所說的“心即理”的脈絡是否能與這裡的“朱子学的另一種歸趣”相符，只能期待作者日後的研究。

從現代的學術觀點出發，只在朝鮮朝儒學的範圍內研究朝鮮朝性理學的發展過程與哲學的意義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必須與宋代理學的形成與開展過程相連繫，才能做到更深入的了解。同樣，只在宋代以後的中國儒學里研究宋明代的朱子學也有局限性。研究朝鮮性理學的主要論題與學說有助於明，清代理學研究者和陽明學研究者。

作者不是作為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開始朝鮮性理學的研究的，而是在研究明代理學的基础上轉入對朝鮮性理學的研究並著成此書。作者對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有很深的研究，說明作者具有研究韓中性理學的扎實基礎。他的這種能力在著作中足以得到確認。

四

当探讨朝鲜儒学界的核心论题时，研究者们经常从‘四端七情’的解释中对于李退溪与李栗谷的不同解释作为中心题材。但作者在解释‘四端七情’时，只阐述了李退溪的立场和观点。而对‘人心道心说’则用四个章节做重点阐述。

朝鲜时代的哲学论辩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的‘四端七情说’，是关于四端与七情的理气论之解释(64 页)。对于四端七情的论辩，在韩国国内虽有过很多的研究，但在本书，李翱以及程伊川的对性和情的关系的论述，‘情’在朱子学当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朱熹在批判湖南学时重视‘情’的问题等论述，都将有助于现在的研究者。

李退溪的‘格物说’对韩国研究者来说也是个极难的课题。还涉及到韩文语法助词问题，所以理解和议论都非常困难。但作者对韩文助词也做了直接的议论与研究。这不得不令人钦佩。作者详细地论述了朱子学的‘格物说’，还结合与之有关的李退溪的‘格物说’，这种观点很有意义。依评者看，作者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退溪的‘理到说’所作的分析和评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章重点阐述了有关罗整庵《困知记》中朝鲜性理学者的不同见解，对这一部分评者实为叹服。尤其还涉及到现代研究者的评论，阐明作者自己观点的部分也不得不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研究成果，全凭作者的学问和实力。

从第四章开始的人心道心说的论议，比任何一个研究更为集中，这种论述将在学术界作出一定的贡献。纵观程朱以后韩中理学界的性理学的开展局面，正如作者所说：“在性理学命题與论爭上，相較於‘四端七情论爭’、‘人心道心论爭’更能顯示中韩儒学的交鋒與影響”(280 页)。比起四端七情的论辩，人心道心的论辩是更加有用的论题。有关四端七情解释的问题，虽然是考察朝鲜理学界中性理学发展的关键，但是人心道心的解释问题，却是纵观韩中理学界性理学发展的重点问题之一。这本书包括《导论》共有八个章节，而其中四个章

节都是有关人心道心说的原由也在此。日后凡是研究韩中理学界人心道心说的研究者们都不得不参考这本书。

评价如此有价值的著作，生怕玷污原著，但是同样作为研究者，作出正确而客观的指正和探讨也是评者的责任，因此要阐明以下几个问题。

在 85 页中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的关系理解成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同等关系的论述，研究者们应要留意。李退溪如果要坚持‘理气互发’的观点，至少不能把四端和七情的关系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相提并论，应把他理解为道心和人心的区别。

李退溪很明确的说过“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稟之異也”(86 页)，但对于这个理论奇高峰也指出了“论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的观点。李退溪若继续坚持这个推论的话，事实上就与奇高峰四端七情的解释没有什么区别了，李退溪有关四端七情解释，也最终被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不顾奇高峰的指责，李退溪仍以‘所指而言者’为依据坚持自己的推论，但研究者们应撤回李退溪的这个推论更为妥当。作者虽说李退溪的这个推论是“义理的滑转”(103 页)，但评者认为研究者们不应再引用其理论。因为在朱子学，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从来就不是两个不同的‘性’，相反李退溪还把四端和七情作为两种独立的情感，在理气论上加以证明。因为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任何性理学者都能认可是同样的性，但人心和道心却根据不同的学者和论述，当作两个不同的心。(参阅 290-294 页)

作者断定李退溪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学者”，李栗谷是“经世之儒”(16 页)，但这种观点很有可能会带来误解。李退溪、曹南冥(南冥曹植，1501—1572)和李栗谷对当时的现实社会的参与都是非常积极的，只有一些区别。曹南冥始终推辞官职，从未出仕。而李栗谷到 49 岁逝去为止一直从政。李退溪从 34 岁考取科举到 49 岁一直从政，虽 50 岁开始过隐居生活，但直到 70 岁去世之前也大约过了 5 年的官场生活。(李相殷，《退溪的平生和学问》，瑞文堂，1973，45 页)当然到了 50 岁以后从政，虽不是他本人的意愿，但不能把李退溪说成是与社

会隔离，专心做学问的学者。

305-306 页叙述的“李栗谷赞同奇高峰‘七情包四端’之说”部分也应留意。一般来说很多性理学者都以七情为人情的总称，因此‘七情包四端’对所有的性理学者都能适用。但通常在四端七情解释上，‘七情包四端’（略称‘七包四’）仅适用于李栗谷。李栗谷对四端七情的解释虽与奇高峰大体相通同，但对于四端七情的理气论之解释两人则并不相同。

人心道心说是朱熹引用《书经》里 16 字中的‘人心’和‘道心’概念，而成为性理学界的核心概念。但这 16 个字是‘伪古文尚书’里出现的句节，因此尤其从清代到现在，中国学术界不少儒学者轻视人心道心概念的学术价值。持‘已被立证为伪文，所以没有再议论的价值’的态度。当然性理学者以及性理学研究者的观点与之会有很大区别，但遗憾的是对这一点作者没有任何论述。

因为内容多难免会有一些错别字，14 页‘吉再’的号不是‘治隐’而是‘冶隐’，金宗直的号也不是‘占必斋’是‘占毕斋’。还把‘奇明彦’写成‘奇彦明’（84 页），“李从退溪”（93 页）和“李故退溪”（105 页）的顺序就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了。

作者用长时间的努力收集的韩国语资料中，并没有看到崔英成所著的《韩国儒学思想史》（全五卷），也甚为遗憾。因为那是近年来少壮派学者在韩国儒学思想史领域里最细致最完整的一部力作。

五

作者说“藉由本書的论述，筆者基本上已經掌握朝鮮前期的性理学思想”（329 页）。评者也认为作者已精通朝鲜性理学的義理脈絡和主要论題。因为作者掌握了宋明理学的義理脈絡和朝鲜性理学的義理脈絡，因此评者相信作者在日后的研究中会作出更有价值的研究。作者也计划将专致于对罗整菴和朝鮮後期性理

学的研究，在此也希望作者对朝鲜朝花潭徐敬德及南冥曹植的地位及作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非常希望作者能进行对栗谷李珥的性理学和朱子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认为罗整菴的理氣論是朱子理氣論的“理論内部的修正”(188 页)，李退溪的理氣論是朱子理氣論的“理論外部的修正”(191 页)。因此很想了解作者对栗谷李珥的理氣論持何种观点。

评者发表以“朱子学在朝鲜时代的流衍”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已有 15 年了。大约到 1980 年代为止，因为研究中韩哲学的很多韩国学者們大部分都到台湾留学或去第三国留学，所以还以为会有很多关于朝鲜性理学的中文資料，但实际在收集資料时却很难找到用中文写成的有关朝鲜性理学关联的碩、博士学位的论文。只有与政治思想有关的学位论文，以及与茶山丁若鏞有关的几篇学位论文。还包括柳承国所著《韩国儒学史》的翻译书，金忠烈所著的《高丽儒学思想史》，王甦所著的《退溪学论集》。除此之外就是中国大陸和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发表的短篇论文。看到作者的这本著作与 15 年前相比，更是感到不管是中文資料还是论议的深度方面，现在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作者系韩国 全南大学教授)